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京報副刊

孫伏園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孫伏園 主編

# 京報副刊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京報副刊：全七冊 / 孫伏園主編. —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4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ISBN 978 - 7 - 5013 - 5794 - 9

I. ①京… II. ①孫… III. ①報紙 - 副刊 - 文獻資料 - 北京市 - 民國  
IV. ①G219.29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53767 號

書 名 京報副刊(全七冊)  
著 者 孫伏園 主編  
叢 書 名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責任編輯 鄧詠秋 李 強

---

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 - mail nlcpress@nlc.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開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張 263

---

書 號 ISBN 978 - 7 - 5013 - 5794 - 9

定 價 4200.00 圓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民國時期文獻出版工作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畫排列)

主任 周和平 韓永進

副主任 于群 王建朗 馬秦臨 孫光奇

張東剛 翟玉霞

委員 王筱雯 方標軍 任競 李西寧

李忠昊 李春來 李培步 平

吳建中 周建文 洪勇剛 馬振犢

倪曉建 徐欣祿 陳力 張勇

鄭智明 劉洪輝 謝林 應長興

『民國時期文獻編纂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畫排列)

主任	周和平	韓永進		
副主任	王建朗	陳力	黃修榮	程天權
委員	王奇生	王開學	毛雅君	方自今
	朱志敏	全勤	何振作	汪朝光
	金以林	周德明	倪俊明	徐大平
	徐曉軍	高紅	陳謙平	桑兵
	孫伯陽	黃興濤	楊奎松	詹長法
屬聲	鍾海珍	羅志田		

『民國時期文獻出版工作顧問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建朗	王曉秋	金沖及	馬大正
姜義華	夏燕月	陳鐵健	章開沅
張注洪	張海鵬	張磊	張憲文
楊天石	劉桂生		

## 總序

中華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不僅與未曾斷裂的文字記錄有關，也與自古有『易代修史』和重視文獻收集、整理等優良傳統密不可分。明有《永樂大典》、清有《四庫全書》，都是有力的佐證。自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日漸加大對古代各時期文獻整理和保護工作的力度，但對具有重要價值又亟需保護的民國時期文獻的重視程度尚需進一步加強。

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而特殊的嬗變時期，新舊交匯、中西碰撞，形成了社會轉型期特殊的文化景觀；同時，這一時期也是中華民族遭受外侮、充滿災難的時期。僅從文化角度考察，一方面傳統文化得到進一步的整理繼承和批判揚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強烈衝擊和影響著當時人們的思想與行爲。特別是馬列著作的譯介與傳播，不僅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而且直接導致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爆發，並由此帶來一系列社會巨變。這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巨大變革，形諸文字，輔之於出版業和新聞業的飛速發展，使得民國時期的出版發行業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短短數十年間，積累了圖書、期刊、報紙以及檔案、日記、手稿、票據、傳單、海報、圖片及聲像資料等大量文獻。這些文獻正是記錄、反映民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重要載體。

概括而言，民國時期文獻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數量衆多。據初步估算，民國時期文獻數量遠遠超過存世數千年的古籍總量，僅國家圖書館一館所藏就達八十八萬餘冊。第二，內容豐富。該時期文獻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既有政府公報、法律規範等方面的文獻資料，也有豐富的文學作品。同時，電影及唱片等作品也大量出現。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文獻形式上，均極爲豐富。第三，歷史和學術價值高。民國時期，中國經歷了內憂外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篇章，產生了大量革命歷史文獻。這些文獻歷久彌珍，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珍貴資料。民國時期又是各種思想交匯、碰撞的時期，留下了大量記載時代印跡的資料，在政治、法律、語言文字、歷史等諸學科都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對研究民國時期的歷史，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第四，現實意義重大。民國時期形成的邊疆墾務、農商統計、中國經濟志、賑災史料等文獻，對研究國家主權、邊境、民族、軍事以及農業、水利、經濟等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也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和國情教育的生動教材。例如，大量有關『東京審判』的文字記錄、照片、影像資料，集中反映了日軍侵略中國的歷史，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有力證據。第五，紙張和印製品質不佳。民國時期正處於從手工造紙向機械造紙轉換的初期，所產紙張酸性高，加之印刷、裝訂等工藝的自身缺陷，造成了文獻印製質量上的先天不足，致使很多文獻出現了嚴重的老化或損毀現象，其保存難度大大高於傳統手工紙文獻。民國時期文獻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對其進行保護的思路必須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創新，如在文獻普查、原生性保護基礎上，充分利用影印出版、縮微、數字化等再生性保護方式，以期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國家圖書館是國家總書庫，履行國內外圖書文獻的收藏和保護職能，爲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立法決策、國

內科學研究和公衆提供文獻信息服務。文獻作爲一個國家的歷史積澱和文化載體，肩負著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承重任，保存、保護和利用好這些文獻，是圖書館人的歷史責任。二〇一一年，在文化部、財政部支持下，國家圖書館聯合業內相關單位啟動了『民國時期文獻保護計劃』，旨在通過文獻普查、海內外文獻徵集、整理出版，以及文獻保護技術研究等各項工作的開展，切實有效地搶救與保護民國時期文獻。

文獻整理出版是保護計劃的一項重要內容，由國家圖書館策劃，將依據文獻的館藏特色、資料類型、瀕危狀況、珍稀程度和社會需求等方面，整合各文獻存藏單位所藏，彙集相關領域專家與出版工作者等多方力量，採取『民國文獻資料叢編』形式，統籌規劃、有序推進，成規模地整理、編纂出版包括民國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外交等各領域文獻，努力爲社會各界提供豐富的、有價值的、便利的文獻資源。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文化復興爲標誌。文化的復興，必須以弘揚傳統文化爲基礎。弘揚傳統文化，又必須以保護、傳承傳統文化爲前提。我們堅信，『叢編』的推出，必將爲民族復興、文化繁榮做出重要貢獻。是爲序。

周和平

二〇一三年一月

# 序

陳子善

《京報副刊》是五四時期四大文學副刊之一，另外三家副刊是《晨報副刊》《時事新報·學燈》和《民國日報·覺悟》，正好北京、上海各佔一半<sup>〔一〕</sup>。但是，這個『四大副刊』的說法起於何時，卻一直未有定論。

新文學界最初提到五四時期有影響力的文學副刊，其實祇有三家，《京報副刊》並不包括在內。朱自清在一九二九年寫的清華大學國文系講義《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中，介紹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副刊時，就是這樣表述的：『日報的附張——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sup>〔二〕</sup>迄今所見到的最早把《京報副刊》歸入『四大副刊』的提法源自沈從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沈從文在北京寫下了他接編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的《編者言》，文中有如下一段話：

在中國報業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榮時代，即從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

海的《覺悟》和《學燈》，當時用一個綜合性方式和讀者見面，實支配了全國知識分子興味和信仰。<sup>〔三〕</sup>

這是首次把《京報副刊》和《晨報副刊》《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相提並論，並且對它們的歷史作用作了很高的評價，雖然並未直接提出『四大副刊』這個說法。

九年之後，曹聚仁在香港寫他『一個人的文學史』《文壇五十年》。書中專設兩章，即第廿五章『覺悟與學燈』和第廿六章『北晨與京報』，討論五四運動以後有代表性的副刊。曹聚仁認為孫伏園主編的『北京《晨報副刊》』，那是新文學運動在北方的堡壘，『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間，由徐志摩主編，也還是繼承著文學革命的任務。孫伏園走出了《晨副》，接編北京《京報副刊》，也就是《晨報》那一副精神』<sup>〔四〕</sup>。可見曹聚仁實際上也認同『四大副刊』的說法。

到了一九七九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五四時期期刊介紹》。該書介紹《晨報副刊》時，如下一段話值得特別注意：

自《晨報》（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改革第七版之後，不少報紙也隨之改進了副刊。上海的《民國日報》從一九一九年六月取消了常刊載黃色材料的《國民閒話》和《民國小說》兩副刊，改出《覺悟》，開始宣傳新文化和介紹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材料，在一九二五年以前，長期起過進步作用。上海《時事新報》（也是研究系的報紙），自一九一八年三月便創辦《學燈》副刊，《晨報》副刊改革後，也實行革新，傳播科學知識和資產階級哲學文藝思想。這些副刊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京報副刊》一起，被稱為五四時期中的『四大副刊』。<sup>〔五〕</sup>

這是目前所看到的首次明確把《京報副刊》與《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晨報副刊》歸併在一起，正式提出了「四大副刊」之說。因此，在新的史料尚未出現之前，五四時期「四大副刊」的提法祇能定為起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當然，《京報副刊》列為「四大副刊」之一，無論就其當時的成就和後來的文學史地位，都是當之無愧的。

## 二

《京報副刊》作為邵飄萍主辦的《京報》的副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創刊於北京，孫伏園主編。孫伏園原為《晨報副刊》編輯，如果他不離開《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就不會誕生。因此，要釐清《京報副刊》的創刊過程，就必須追溯孫伏園何以離開《晨報副刊》，對此，已有不少研究者作過頗有價值的梳理<sup>〔六〕</sup>。不過，仍可以再作進一步查考，儘可能發掘尚未被研究者注意而幾近湮沒的歷史細節。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北京《晨報》第七版「文藝欄」改版為單張四版的《晨報副刊》，由原協助李大劍編輯「文藝欄」的孫伏園擔任編輯。在孫伏園的精心主持下，在周氏兄弟等的傾力支持下，《晨報副刊》辦得風生水起，成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新文藝的重要的公共空間。誰知到了一九二四年十月，因魯迅打油詩《我的失戀》無法在《晨報副刊》刊出，和已經陸續刊登的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長的故事》也被晨報社方叫停，孫伏園憤而辭職了。關於此事的來龍去脈，被廣泛引用的是孫伏園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回憶：

一九二四年十月，魯迅先生寫了一首詩《我的失戀》，寄給了《晨報副刊》。稿已經發排，在

見報的頭天晚上，我到報館看大樣時，魯迅先生的詩被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抽掉了，抽去這稿，我已經按捺不住火氣，再加上劉勉己又跑來說那首詩實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說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來，於是我氣極了，就順手打了他一個嘴巴，還追著大罵他一頓。第二天我氣忿忿地跑到魯迅先生的寓所，告訴他『我辭職了』。魯迅先生認為這事和他有關，心裏有些不安，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事情雖是從魯迅先生的文章開始，但實際上卻是民主思想和封建思想的鬥爭。〔七〕

但是，孫伏園在事發僅一年之後所作《京副一週年》中的回憶卻是這樣的：

魯迅先生做好這詩以後，就寄給我以備登入《晨報副刊》。那時我的編輯時間也與現在一樣，自上午九點至下午兩點。兩點以後，我發完稿便走了，直到晚上八點纔回館看大樣。去年十月的某天，就是發出魯迅先生《我的失戀》一詩的那天，我照例於八點到館看大樣去了。大樣上沒有別的特別處理，祇少了一篇魯迅先生的詩，和多了一篇什麼人的評論。少登一篇稿子是常事，本已給校對者以範圍內的自由，遇稿過多時，有幾篇本來不妨不登的。但去年十月某日的事，卻不能與平日相提並論，不是因為稿多而被校對抽去的，因為校對報告我，這篇詩稿是被代理總編輯劉勉己先生抽去了。『抽去！』這是何等重大的事！但我究竟已經不是青年了，聽完話祇是按捺著氣，依然伏在案頭上看大樣。我正想看補進的是一篇什麼東西，這時候劉勉己先生來了，慌慌忙忙的，連說魯迅的那首詩實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為抽去了。但他祇是吞吞吐吐的，也說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緣故來。這時我的少年火氣，實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舉手就要打他的嘴巴（這是我生平未有的恥辱。如果還有一點人氣，對於這種恥辱當然非昭雪不可的）。但是那時他不知怎樣一躲閃，

便抽身走了。我在後面緊追著，一直追到編輯部。別同事硬把我攔住，使我不得動手，我遂祇得大罵他一頓。同事把我拉出編輯部，勸進我的住室，第二天我便辭去《晨報副刊》的編輯了。……我今天提到這件事，並不因為這也是我的生活史上重要的一頁，而是因為有了這件事纔有今日的《京報副刊》週年紀念日。《京報》自然在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出它的副刊，但倘沒有這件事，《京副》與『伏園』或者不發生什麼關係，『十二月五日』與『《京報副刊》週年紀念』或者也不發生什麼關係。不但此也，因為我的『晨副事件』而人人（姑且學說大話）感到自由發表文字的機關之不可少，於是第一個就是《語絲》週刊出版。《語絲》第五十四期裏，周豈明先生已經提起這件舊事。所謂『這件舊事』者，關於上面所講魯迅先生《我的失戀》一詩還祇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關於豈明先生的《徐文長的故事》，豈明先生所說一點兒也不錯的。不過討厭《我的失戀》的是劉勉己先生，討厭《徐文長的故事》的是劉崧生先生罷了。〔八〕

兩相對照，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伏園與《晨報》代總編輯劉勉己發生衝突並且決裂的原因，他最初提供的也是最可信的說法有兩個，主要原因也即導火綫是魯迅《我的失戀》『抽去』不能發表，次要原因是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長的故事》被叫停<sup>〔九〕</sup>。有必要補充的是這個次要原因披露時間還早於主要原因，周作人《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中已經說得很清楚：『當初你在編輯《晨報副刊》，登載我的《徐文長故事》，不知怎地觸犯了《晨報》主人的忌諱，命令禁止續載，其後不久你的瓷飯碗也敲破了事。』<sup>〔十〕</sup>此文比孫伏園《京副一週年》早發表十四天，正可互相印證。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次要原因卻消失得無影無蹤，魯迅《我的失戀》不能發表成了孫伏園離開《晨報副刊》唯一的原因。這是不符合史實的，應該澄清。

按照孫伏園在《京報一週年》中所說，與劉勉己衝突的第二天，他就辭去了《晨報副刊》編輯職務。周作人日記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記云：『伏園來，云已出晨報社，在川島處住一宿。』魯迅日記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也記云：『午後伏園來。』這兩條日記提供了重要的時間節點，由此應可推測，在辭去《晨報副刊》編輯後，孫伏園立即先後走訪周作人和魯迅報告此事。那麼，孫伏園為魯迅《我的失戀》與劉勉己當面衝突的日期往前推算，就當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即十月二十三日晚，孫劉發生衝突，二十四日孫向劉提出辭呈後離開晨報社，即赴周作人寓所通報，二十五日又赴魯迅寓所通報。至於此事向文壇公開，則要等到一週以後了，《晨報副刊》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四版刊出了《孫伏園啟事》：『我已辭去《晨報》編輯職務，此後本刊稿件請直寄《晨報》編輯部。』

孫伏園離開《晨報副刊》之後，頻繁拜訪周氏兄弟等，醞釀創辦新的能夠『自由發表文字的機關』。很快，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周作人日記云：『下午……又至開成北樓，同玄同、伏園、小峰、矛塵、紹原、頤剛諸人議刊小週刊事，定名曰《語絲》，大約十七日出版。』第二天魯迅日記云：『上午……孫伏園來。』這應是孫伏園向魯迅匯報昨天的《語絲》籌備會。該年十一月十七日，《語絲》週刊果然按計劃在北京應運而生，孫伏園全力投入《語絲》的編輯。然而，歷史又向他提供了一個新的主編副刊的機會。

### 三

討論《京報副刊》的創辦，除了孫伏園和周氏兄弟，還不能遺漏一個人，那就是當時與《京報》有關係的文學青年荆有麟。荆有麟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版了一部《魯迅回憶》，書中有專章回憶《京報副刊》的創刊。在『《京報》的崛起』這一章中，荆有麟回憶在世界語專門學校聽魯迅講課時得悉孫伏園離開《晨報副刊》，就與一起編《勞動文藝週刊》（《京報》代為發行）的胡崇軒、項亦愚商議，擬請孫伏園為《京

我們當時對於《京報》很關心，時時向《京報》主人邵飄萍先生，提供改革意見。這一次，聽見孫伏園離開《晨報》了，很想要《京報》創刊一個副刊，請孫伏園作編輯，三個人談論的結果，覺得這辦法很好，但有問題的，是《京報》請不請孫伏園呢？假使《京報》願請孫伏園，而孫伏園又肯不肯幹呢？兩方面都沒有把握。因為我們曉得：《京報》本來有副刊，不過它的副刊專登些賞花或捧女戲子的文章，而編此副刊者，又係與邵飄萍很有交情，且在《京報》服務多年的徐凌霄。那麼，邵飄萍肯不肯停了徐凌霄所編的副刊，而另請孫伏園呢？而且伏園本人，我們都不認識他，萬一邵飄萍答應請他。誰又有方法也使他答應呢？但即就是有這些困難吧，我終於大膽地找邵飄萍去。

我對邵飄萍述說了孫伏園向晨報館辭職的經過，並告訴他《京報》應該借此機會，請伏園代辦一種副刊，意外地，邵飄萍馬上首肯了。而且他還說：

『我想：除請孫伏園先生編副刊外，《京報》還可仿照上海《民國日報》辦法，再出七種副刊，每天一種，周而復始。這樣，可以供給一般學術團體，發表他們平素所研究的專門學問。』

『能這樣，當然更好。』

『那麼，我們就這樣決定：本報副刊，就請貴友孫伏園先生擔任編輯。另外，七種附刊，請你設法相幫找一兩個，我這裏也有幾個團體接過頭。本報也預備出一種圖書週刊，大約七種附刊，不會成問題。』

這真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京報》願擔負起倡提新文化的使命。但伏園，在